

编辑故事

只要他们眼里有光
出版的气候就不会变冷

我在每个月写《文艺报》“编辑故事”主持人语的时候，照例都会先写一下那个时候的天气，倒不是因循“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套路，而是想让这个版面的读者与我置身在同一个虚拟的江南空间——让北国的同行先行嗅到江南春天的气息，让南国的同行感受到与北方不同的江南冬天独特的寒风，更让西北的同行同情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的体验。

祖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自然物候差距很大，但出版环境差别不大，或者说几乎没有差别，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变化和挑战中。如果有差别，一定是人的主观反应和能动性不同。

四月底，全国各家大型出版上市企业都发布了年报——一片狼烟。在这其中，我发现湖南出版人和广东出版人做得不错，很淡定、很从容，于是我花了较长时间赴中南出版集团和南方出版传媒进行调研，分别与中南出版集团的新老领导和博集天卷的好友，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部主任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细致的交流。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我看到他们沉浸在前辈编辑蔡皋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喜悦中，并迅速将她的作品做足做精，我看到他们多年来矢志不渝地做少儿科普并将这个板块做大做强，我看到了刘星保社长“老品新做、新款打爆”的出版营销理念。在湖南教育出版社，我看到了他们多年打造的“华罗庚数学奖”在持续不断地发光，看到了他们拓展教育产品的边界、融合推动的成果；在和黄隽青的交流中，看到他的不俗战绩和湖南国有、民营出版人齐心协力的搏击。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我看到退休的原总编辑钟永宁在肖风华社长的感召下，返聘后发光发热、备受社里员工爱戴的环境，看到“之间”北京工作室与广东编辑部的联动，了解到“万有引力”这一茁壮成长的子品牌的成效，以及其主理人滔滔不绝地倾情介绍，看到“岭南文库”一本本精品的不断推出，看到他们在短剧市场令人赞赏不已的开拓以及与国内知名影视平台合作取得的荣誉，特别是他们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出版理念……

我没有去上海，但去年底曾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纪文景”。多年来，姚映然带领的“文景”团队在市场化、精品化、品牌化方面的开拓，为集团的“世纪谱系”增添了灼灼光彩，当我请姚映然为我写文章时，她机智地推荐了副总编辑贾忠贤来写。

陆晨希是译林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到目前为止，成长得很不错，无论是做书还是做书的传播工作，她在译林成长的故事始终激励着今天的译林人。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爱出版的人在译林成长、在凤凰成才。

人能不能胜天，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近几十年来的气候变化部分是人为造成的：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人类的自律能有效改善这一状况。出版的气候也如此：这一气候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很多出版人不再用心做出版。只要我们像湖南出版人、广东出版人、文景出版人、译林出版人那样认真地做出版，我坚信出版的气候会变好——只要他们眼里有光、有爱、有温暖，出版的气候就不会变冷。

——主持人 徐海

劳动节假期结束回来上班第一天，看到了新鲜出炉的《鞋帮：中国运动品牌四十年》的样书。即便我和伙伴们，围绕这本书已经开过很多会，碰了很多次资源，从内容到文案又来回精修了几轮，已经有些麻木了，但是看到实体书时，仍然忍不住摩挲了一会儿——它闪闪发光、器宇轩昂。

在我的工作文件夹中，这个项目的编号是121，创建于2023年初，第一份文件只是一个想法。然后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被这个项目吸引到一起。它在项目的赛跑中，是个“后进生”，在它出版之前，编号144的文件夹都已经从“制作中”转移到了“已出书”。现在，我终于也可以把121号文件夹挪到那个位置了。

《鞋帮》写的是中国运动鞋制造企业40年的踏浪征途，这里面有安踏、李宁、特步等佼佼者，他们要么踩中了时机，要么熬过了危机，也有引领一时潮流的先后寂寂无名的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水大鱼大，他们要去自己扑腾。

在有限性中生存、成长，这很迷人。如果说大国重器、大国工匠折射着国家实力，反映着体制特性；那么这些并不关系“命门”的、平凡的日常消费品制造，则是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试炼场——让人惊叹的草根智慧、让人佩服的做事方法、让人感慨的时代基底。所以这本书写的并不是鞋，它写的是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发展的40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40年，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

很难，我都很难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但是作者黄子懿老师一下就明白了我在说什么。他用雕琢一个核桃的文字功力，在雕刻一个宇宙。他在刻画一双鞋的时候，心里装着的是一个时代。除了完美的作者，我们还有一个完美的团队：耐心包容的领导、靠谱的同事、随时提供帮助的合作方。

今年是我在译林做编辑的第十四年。在此之前，我先做了译林二十多年的读者——如果从幼儿园时我从爸妈房间里翻出《译林》杂志开始算起的话。我始终觉得，要讲起和译林的故事，绝不能从正式入职说起，那样实在太“班味”了，不够有趣，也会错过许多有意思的呼应和回响。

从木刻版“经典译林”说起

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并不懂什么是出版社，只是单纯看封面图画好不好看，书中的故事不精彩。十岁生日时，外婆送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扉页上题了字：“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生活、工作！”我至今仍记得那本书的封面：庄典雅雅的黑底金字，富有韵味的木刻版画，硬壳精装，书脊下方印着绿白配色的“三棵树”图标，十分灵动。作家创作文学作品，那么是谁把这些文字做成一本书的呢？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每一本书背后，有一群看不见的人，在阅读这件事忙碌着。多年以后，我来到译林，还专门找美编老师问起这套木刻版“经典译林”的情况，了解到那套书是资深美编洪佩奇老师设计的，采用了艺术家杨春华的版画，每一本的图案都与内容契合，精挑细选，深藏巧思。这就是编辑的功夫，于无声处力千钧，穿透时间。

记忆中，少年时期还有一件与图书相关的大事，依然与译林有关——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中文版首发。那是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夏日炎炎，我从报纸上读到这本书发售的消息，兴奋不已。中学正是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十分旺盛的时期，体力也好，对国际政治十分感兴趣。新华书店柜台前人头攒动，我硬是排了一圈一圈人，才买到了这本传记。多年后有幸与老前辈施梓云老师吃饭，谈起往事，我说到这本书，施老师眼睛瞬间亮起来：“那时我们直接给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写邮件！”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本书当时由三位年轻编辑共同负责，使用两间办公室，一间用来连轴转编校稿件，一间用来轮流短暂休息。翻译问题、编校问题、版权方提出的各类问题蜂拥而至，而这一切都需要编辑以极大的责任心、专业能力和自信一一化解。当了编辑以后，想起当年三位责任编辑以这样的意志、心意和技艺做书，还是觉得十分感慨。

到了大学，读了中文系，自以为要开始读一些不一样的。就这样，本该好好去读古典文献的我，被人文社科图书深深吸引。当时读的一套书，是刘东老师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米歇尔·福柯、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克利福德·格罗茨、《比较的幽灵》《浪漫主义的根源》《传统的发明》……几乎写满了我的图书馆借阅记录。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图书尤其是社科图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不仅会读内容，做译本对比，还会关

做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清晰

□贾忠贤

其实不止于此，此刻浮现在心里的是那些随时接受“安利”，并且无私伸出援手托举的朋友们。

翻开这本书的后勒口，数一数，虽不多，“文景·中国之治”这个系列也积累了10种图书了。战线确实拉得很长，放在这个系列里的第一本书是陆铭老师的成名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那是2016年出版的。这套书因为2021年出版兰小欢老师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走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中。后来在大众读者中认知度比较高的还有林小英老师的《县中的孩子》，以及2025年年末出版的聂辉华老师的《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这套书到目前为止，总造货码洋大概有1.5亿，总册数大概有250万，这个单品效率其实是意料之外的。

我有时候会想，这套书也许做得有些任性。文景作为市场化的出版机构，肯定是要为读者（用户）做书的，但从发心而言，这套书与其说是为读者做的，不如说是编辑为自己做的：只是恰好，编辑与读者共享了一种内容审美。

我在焦虑的时候做噩梦，从来没有梦到过考试，没有梦到过高考考场。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试卷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因为确定性很强。我梦到的永远是想完成一件事却怎么也完成不了，想说出的一句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遵循规则，不断来到新的环境，面对新的境遇，解决新的问题——在这个巨大的世界里，我因为并不具备天生的认知智慧，而能得到的认知帮助又十分有限，所以转过身来看自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到的画面，是混沌世界里一个外在木讷、内心慌乱的人。问题的关键是改造世界。但对被扔进具体环境的个人来说，认识世界是刚需。在漫长的大学生活中，我认识了



贾忠贤

荷马和苏格拉底，认识了卢梭和伏尔泰，认识了康德和休谟，认识了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也读过《左传》，读过“四书”……但我在做书时依然不知道该如何排座位、在找工作时搞不清“五险一金”是什么。在生活世界中开辟出来一个自己的容身之地，需要学习大量的东西——对编辑而言，这是个邀请。

2012年的夏天，我到文景的上海办公室报到，坐在会议桌边等待我的编辑部主任晓琳接应我。旁边就是样书架，我来回看了一圈，把《中国触动》抽出来，开始翻看，打发时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张维为老师是谁，也并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书，就是单纯觉得这书挺有意思。虽然读书时就看过不少文景出品的图书，尤其是西方学术原典，但是在毫无目的的阅读场景下，就这样结下了缘分。后来晓琳离职，张老师的书传到了我手上，我也知道了这些书有个专有名词，叫

与书相伴 并肩共行

□陆晨希



陆晨希

注版式、设计、用纸和工艺。因为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借阅，经常会发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比如，我注意到“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初期曾有不同封面设计，后来才固定为“米白色底+棕红金图标”的经典设计。不知不觉间，在读者身份之外，我似乎也做好了成为一名编辑的准备。

为了进入译林，读了两周杂志

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我就想来译林出版社做编辑，更具体一点，则是想做社科编辑。不巧的是，我应聘那一年，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出版中心并没有招聘名额，其他招聘岗位则来自外国文学、教育分社和期刊分社。我仔细阅读应聘要求：外国文学要求英语专业八级，这让非英语专业的我只能遗憾退场；教育分社要编写英文教材教辅，这对颇为头疼英语考试的我来说，挑战也有些大。最终，我把目光投向期刊分社，也是我的阅读原点：《译林》杂志。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那一年期刊分社招聘特别提到了“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主题，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在顺利通过笔试后，我抓紧研究期刊分社出版的各类杂志的情况，认真准备面试。

现在回想起面试的场景，仍然觉得青涩而珍贵：第一次来到出版社的新鲜与兴奋，面试时学日剧穿搭了小西装外套和套裙，甚至还穿了高跟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甚至还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记得当时坐在中间的一位非常美丽而有气质的老师提问：“有没有读过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的《国际博物馆》杂志？”我老实回答，在应聘前确实不甚了解，但在准备过程中了解到这本杂志，发现南京大学图书馆有，但不在鼓楼校区，而在仙林校区阅览室，不能借出，于是连续半个月去仙林校区的图书馆把近两年出的杂志都读了。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当时在社里分管杂志的副总

谢山青。在一次与新进青年员工的座谈会上，她还特别提到了我回答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女孩特意找杂志来研读，还跑去那么远的图书馆——能有这样的用心，下这样的功夫，正是译林所需要的。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也更体会到译林对于“做编辑要用心”这一点的重视。其实，我当时就租住在仙林，仙林校区在我租住小区的对面，确实用心，但实在不好意思说下功夫——还远远不够呢。

工作第八年，再次成为“新编辑”

就这样，我顺利入职译林，到期刊分社学习做《国际博物馆》杂志和文博类图书。现在想来，那段工作经历对我编辑能力的训练影响深远：做杂志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双月刊要求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制都有严格的进度规划。做文博图书，除了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在原创组稿和编辑工作方面尤其注重人和人的沟通交流。厚重精美的图书插图册，则让我一个新编辑得以很快接触到复杂的装帧工艺和印制工作，不仅是从文字和图像上，更是从可触可感的纸面书页中，不断加深对做书的理解。当时带我的编辑部张遇主任特别注重带着编辑去观察，去感受，去实践。记得编中英双语的《中国博物馆手册》时，除了线上联络几百家文博单位，我们编辑团队还实地探访了云冈石窟、大云山汉墓考古现场等。采访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考古专家、讲解员、学者和研究员——在与不同专家的交流和交往中，撷取倏忽即逝的灵感，沉淀到扎扎实实的案头上去。

工作第八年，我从期刊分社调入人文社科出版中心。换部门的申请是我提出来的，这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译林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大家认真倾听我的想法和规划，提出各种中肯的建议。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很多预期和想法，实在有很多不成熟的部分。而让我尤为感激的是，译林的领导和前辈首先看到了编辑眼里的光和心中的火。记得时任总编辑袁楠问我，有没有这个觉悟，在工作第八年重新成为新人，在新领域从头开始？我说，我可以。“心态上做好新人。”她补充说，“状态上要拿出工作八年的实力。”

就这样，我开启了作为社科编辑的新篇章，终于编上了心心念念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时编的第一本书就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我也有机会求教于这套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刘老师思想深邃、才思敏捷、精力过人，除了推荐最新选题，也常分享他个人的最新创作，我常先睹为快，乐在其中。

当时在部门主任陈叶的带领下，我们部门运转井井有条，发展欣欣向荣，全体编辑各有所长，选题安排周全。作为新人的我，在自己策划选题之前，也需要在部门既有资源

“主题出版”。同时我还在做西方思想史方向的选题，比如，我接手了汉娜·阿伦特，当时在领导的支持下，把《责任与判断》重版改名为《反抗“平庸之恶”》，收获了超出我意料的市场反响。

内容的意义，是由它所在的内容序列决定的——这是文景的选题最看重的要素：策划思路和产品线。同一个内容，放置在不同的策划思路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以及未来的走向、后续产品的选择。

在我混沌不堪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机会，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总裁陈昕先生编辑一本集子。我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信任和时间：陈总所有出版发表的作品就在那里，随便我组合。借着这个机会，我把这套作品系统地看了一遍。在此过程中，我的系统升级了——我看到一位资深出版人是如何做选题的。我触摸了那原初的问题意识和出版动力。于是原来构成问题的事情，就不成问题了。

在“中国之治”这套书中，有一本书叫《宏大细节》，讲的是北京冬奥会组织过程中的细节。“宏大细节”这个书名，是作者提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个好名字——当我们和读者一起去认识这个混沌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宏大”代表了理解世界的框架，“细节”代表了把握世界的锚点——两者缺一不可。如果问“中国之治”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到底什么样的作品，能帮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那就是既“宏大”又“细节”的作品。“宏大”来自作者多年专注于某一领域研究而获得的理解深度，“细节”来自作者用双脚对这片土地的丈量，然后作者把满腹的话抒干了，真诚地托付给读者。编辑能在这个过程中，陪着他们跑，跟他们在同一片风景下赞叹，多好啊——这就是私心了。

（作者系世纪文景副总编辑）

中找到兴趣点。就在这时，我在部门存量选题中发现了一部《樊锦诗访谈录》。那是2019年初，“敦煌热”还未升温，樊锦诗这个名字也远没有如今这般家喻户晓，但对于一个在文博出版领域工作多年的编辑来说，这个选题实在令人激动。我立刻准备材料，向陈老师报告了对选题的兴趣，希望可以有机会参与编辑工作。陈老师笑着说，这个选题最早诞生于译林社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的合作，已经存在多年，因为各种原因立项后一直没有启动，正好就在近期，作者联系可以推进，并有意将原来的访谈文本作为素材，创作一部人物传记。“欢迎加入编辑组！”陈老师真挚地对我说。那一刻，我感到有光闪过，记忆中的很多场景旋转、交叠、浮现眼前：从小阅读译林社图书的美好回忆，在期刊分社编辑文博书稿的日日夜夜，汇聚到当时当下——我，有机会作为一名译林社的编辑，参与樊锦诗老师传记图书编辑工作。

后面的故事温馨而充实。在陈叶老师的带领下，编辑团队与两位作者樊锦诗老师、顾春芳老师密切合作，最终诞生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有一次，樊老师给我寄来出版合同和参考图书，附上手写便笺：“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各位同志，为编辑出版、发行《我心归处是敦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对于这部由众多译林人倾注心血的“中国好书”，樊老师始终无比谦逊地、细致地表达着她的认可与感谢。做图的设计师、对接印厂的印务老师、直播荐书的主播、推介图书到海外的版权经理、线上线下奔走不停的营销发行老师、库房发货的师傅……樊老师细细地一个个过问，嘱托将她的问候带给每一位译林人。

心归处，在林中

今年是我在译林社做编辑的第十四年，我想再做些新的内容。译林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已耕耘近三十载，有着“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人文精选”“译林思想史”“伯林文集”等成熟产品线。如今，AI时代全面降临，信息的捕捉、知识的获取变得愈发便捷而混沌，而对“人如何之所以为人”的追问，也变得尤为珍贵。在越发多变的图书市场面前，如何盘活、重组、激活和创新，坚守和传递人文之光，是编辑部的责任与挑战。我们正在策划创立一个译林旗下的全新社科子品牌，名字就叫“林中路”——既来自海德格尔的《林中路》（Holzwege），寓意在反复思辨中不断追求被遗忘的“存在之真理”，又是一条由一代又一代译林人走出的“林”中之“路”：以澄明的心灵联结作者与读者，与书相伴、并肩同行。这条路，我想继续热切地、踏实地走下去。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副主任）